

# 跨文化视角下的身份重构

## ——论严歌苓长篇小说《陆犯焉识》

李雨霏

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作为第三代海外华文作家的代表，严歌苓的跨文化写作立场赋予《陆犯焉识》独特的叙事视角与文化视野。小说以20世纪20年代为背景，围绕陆焉识的一生，展现其在西方个体文化与中国集体文化的双重压迫下，富家公子、留学博士、大学教授、阶下囚、西北劳改犯等多重身份的叠加、撕裂与重构。在时代暴力与生存重压下，陆焉识的外在社会身份被彻底清零，却在绝境中完成人性回归与精神重构。本文以跨文化视角为切入点，梳理陆焉识的多重身份演变历程，探讨其在中西文化冲突中的身份迷失、清零与重构，并揭示作家自身的文化境遇与人物命运之间的深层互文关系。研究表明，陆焉识的身份重构不仅是个体知识分子的精神蜕变，更是一代知识分子在历史洪流中的命运缩影，彰显出严歌苓超越文化差异、回归普遍人性的文学追求。

**【关键词】**：严歌苓；《陆犯焉识》；跨文化；陆焉识；身份重构

DOI:10.12417/2982-3846.26.02.015

### 1 严歌苓所代表的第三代海外华文作家的跨文化写作立场

严歌苓作为第三代海外华文文学的代表作家，自1989年赴美留学并定居美国后，在国族文学史中便被边缘化。她既不算中国本土作家，也不算外国本土作家，正如梁艳所指出的，以严歌苓为代表的新移民作家恰似“文学蝙蝠”，非鸟非兽，在国族文学史叙事中处于尴尬却独特的边缘位置<sup>[1]</sup>。其独特之处在于她长期身处中西两种文化语境中，既受到中国历史经验、传统伦理观念与东方叙事传统的影响，又接受了西方精英教育与个体主义思想观念，两种文化的相互作用下，共同塑造了她扎根中国文化又超越本土视野的独特写作姿态，使其以一种外部、冷静、平视且尊重个体的跨文化立场进行文学创作。

与前两代作家多带有“被迫出走”的流亡色彩不同，严歌苓是主动选择海外写作的职业作家。这种“远距离回望”的空间位置，使她能够跳脱单一文化视角的局限，以更具国际化、客观性与反思性的眼光审视中国历史与现实，书写具有普世性的中国故事。

这一跨文化立场鲜明地体现在其人物塑造与叙事选择中。严歌苓始终对“文化夹缝中的边缘人”抱有强烈的书写执念，她习惯于对同一人物原型进行反复演绎与创新性修改，通过不同文本间的互文对话深化对人性与历史的思考<sup>[2]</sup>。例如《扶桑》中在异国仍保有生命尊严与自我意识的华人女性、《小姨多鹤》中在中日两种文化夹缝中挣扎生存的多鹤以及《陆犯焉识》中兼具西方知识分子精神与中国历史受难者双重身份特质的陆焉识，这些核心人物共享着“双重文化身份”与“精神漂泊者”的本质特征，与作家自身的跨文化境遇形成深刻互文。

同时，跨文化的写作位置也赋予了严歌苓一种疏离而清醒的“俯视”视角，使其能够相对超脱于本土意识形态与宏大叙事框架，回归人性、生命与个体命运本身。在《第九个寡妇》

中，她避开主流历史话语，从民间生命本能与人性本真出发，勾勒出乡村半个世纪的生存模式；在《金陵十三钗》里，她超越简单的家国仇恨，聚焦于战争中女性的尊严、牺牲与人性光辉的塑造。这种超越民族、国别，直击人类共通情感的写作方式，正是其跨文化立场的集中体现。

严歌苓的写作实践，也集中呈现了第三代海外华文作家的整体特征。相较于第一代作家浓烈的家国乡愁与流亡意识，以及第二代留学生作家突出的文化冲突与身份焦虑，以严歌苓为代表的第三代作家，通过对同一母题的反复书写与互文对话，实现了海外华文文学从“乡愁书写”向“世界性写作”的重要转向<sup>[2]</sup>。

### 2 陆焉识身份重构的文本阐释

《陆犯焉识》中，主人公陆焉识是一个多重身份叠加、持续处于精神撕裂与身份剥夺状态的知识分子典型。按照小说的时间发展顺序依次分析，陆焉识有以下几层身份。

首先，他是一位旧时代的富家公子，“陆家刮刮锅底，也撑得死两三代人”的叙述，直观地呈现出其优渥的家庭环境<sup>[3]</sup>。作为备受继母恩娘宠溺的儿子，他自幼生活在衣食无忧、无须为生计操劳的家庭中。恩娘时常为其购置衣物、私下给予钱财，纵容其肆意挥霍的消费观念。这种物质充裕、缺乏约束的成长环境，塑造了他自由散漫、不受规训的性格底色，也为其日后接受西方个体主义文化埋下了重要伏笔。

其次，陆焉识是西方现代教育塑造出的典型精英知识分子。留美五年的经历使他形成鲜明的西式人格：言辞犀利、热衷公共表达、行事张扬、崇尚个体自由。无论是参与校园讨论，还是针对国际政治议题发表见解，他都展现出西方知识分子式的批判意识。这种外向、独立、以自我为中心的精神特性，与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化所推崇的含蓄、内敛、中庸形成鲜明对

比。然而，这一由西方文化建构的精英身份，在其归国之后又迅速瓦解崩塌，成为其身份困境的开端。

归国后，陆焉识被迫承担起家庭伦理关系中的全部男性身份，恩娘的情感依附对象、冯婉喻的丈夫与孩子们的父亲。他被迅速卷入传统宗法秩序之中，其个人意志被家族责任所覆盖。他的婚姻由恩娘安排，成为维系家族体面与延续香火的工具，而非情感选择的结果。在婚姻关系中，他长期处于情感疏离状态，以精神逃避与自我放逐回避责任，形成典型的“伦理失语”。冯婉喻愈是坚守与付出，陆焉识的冷漠与逃避便愈凸显出其在传统伦理结构中的精神挣扎。

与此同时，陆焉识还拥有大学教授的社会身份。作为知识分子，他在讲台上兼具学识与风度，以理性精神反思传统文化与礼教束缚；但在现实生活中，他却深陷封建礼教的规训中难以挣脱。他在思想上追求现代性与个体解放，在行动上却受制于传统家庭结构，这种知与行的分裂、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构成其知识分子身份最核心的精神撕裂。

政治运动的到来，使陆焉识的身份发生颠覆性变化，由精英知识分子变为反革命分子与阶下囚。社会身份被彻底剥夺，尊严与地位荡然无存。正是在这一绝境中，他开始真正思索、感知冯婉喻长久以来的深情与付出。探监时带来的食物，不单是生活物资，更是承载情感、责任与救赎的生命符号。陆焉识在囚禁中完成迟来的情感觉醒，却已身陷绝境，悔之晚矣。

在所有身份中，西北劳改犯构成陆焉识生命历程的最核心身份。龚自强在对《陆焉识》的研究中指出，小说并非简单的历史控诉，而是一种具有深度复杂性的“后伤痕”书写，它在政治暴力的重压之下，依旧执着地呈现人性的坚韧与情感的力量<sup>[4]</sup>。他被剥夺姓名，以外号“老几”生存，成为集体化体制中无差别的、可随时被替代的生命个体。饥饿、严寒、苦役与精神羞辱构成其日常，但他并未彻底从众。为求生存，他伪装口吃、隐忍退让、避免冲突；在极端匮乏的环境下，他以“盲写”的方式在精神世界中坚持思考与书写，守住知识分子最后的精神底线。肉体被囚禁，思想却保持独立，这一分裂状态恰恰凸显出其知识分子本质。

劳改七年之后，场部礼堂播放的科教片成为重要转折点。为一睹银幕上女儿丹珏的影像，陆焉识冒险贿赂、冒雪夜行，虽仅观看到影片末尾，却由此激起他与亲人重逢的强烈渴望。这一看似微小的事件，最终成为其出逃的直接动因。

此后，陆焉识成为逃亡逃犯，在隐匿与漂泊中完成对亲情的回归。最终，为避免妻女被牵连为“敌属”，他主动自首。至此，他彻底告别西方精英文化塑造的自我，将生命重心回归于家庭、责任与情感之中，实现身份的最终和解。

至此，陆焉识的多重身份彻底建构完成。从富家子弟到留洋精英，从家庭身份到社会身份，从政治囚徒到劳改犯，再到

回归情感的归家者，其身份变迁深刻呈现出知识分子在特殊历史语境下的生存困境与精神重构。历史暴力、传统伦理与生存压力层层剥除其社会身份，却也使其回归最本真的人性。陆焉识的悲剧性，正在于他在身份被彻底清零之后，才真正理解爱、责任与救赎的意义。他的归来与自首，标志着知识分子从自我放逐到精神回归的完整历程，使其成为当代文学中极具历史深度与人性内涵的知识分子典型。

### 3 跨文化冲突中知识分子的“身份清零”与“人性重构”

陆焉识的一生，是美国现代个体文化与中国传统集体文化持续碰撞、冲突，最终在历史重压下完成重构的一生。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伦理为核心，强调家庭本位、集体优先、长幼有序，个人意志必须服从集体利益，因此个体价值常被置于伦理秩序之下。与之相对，美国文化以个体主义为核心，强调个人自由、权利优先、自我实现，鼓励个体突破束缚、追求独立价值。两种文化存在根本差异，而这差异必然导致冲突。

故事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上海。这一时期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输入规模最大、冲击最为剧烈的时期。作为沿海通商口岸与租界城市，上海是西方文化传播的前沿重镇，西式教育、英文语境、现代生活方式与都市文化深刻影响着青年知识分子的生活。西方文化的渗透不仅塑造了陆焉识的生活趣味，更催生了他对西方现代文明的精神向往，为其赴美留学与文化认同奠定了基础。

西方文化对陆焉识的影响并非抽象概念，而是体现在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情感态度三个层面。陆焉识在美国留学期间，崇尚自由恋爱、重视个人情感、追求精神独立，不愿被婚姻、家族、政治所束缚，在他与加拿大女孩望达的情感关系中，陆焉识从未向望达坦白自己在国内已有婚约，也从未思考过这段感情的归宿与结果；他享受西方文化赋予的“爱与被爱”的权利，却刻意回避了情感背后应有的担当。对他而言，爱情是自我实现的方式，而非彼此托付的约束；快乐是首要目的，责任是不存在的。这种文化倾向使他在面对中国传统家庭伦理时，表现出明显的疏离与不适。

归国以后，他立刻被卷入以家族伦理、社会秩序、集体意志为中心的传统文化结构之中。他追求的“自我”与传统家庭要求的“顺从”冲突；他追求的“自由婚恋”与传统“包办婚姻”冲突；他追求的“独立人格”与传统“等级秩序”冲突。这种文化错位使他陷入持续的精神痛苦。当然，他也尝试反抗了。书中，同学大卫·韦多次劝说陆焉识加入激进政治组织，希望他投身集体运动、承担社会使命，但均被陆焉识明确拒绝。对陆焉识而言，加入党派意味着放弃独立思考、交出自由意志、服从集体立场，这与他从西方文化中获得的个体独立、思想自由、精神自主完全相悖<sup>[5]</sup>。他不愿成为意识形态的追随者，即

便大卫·韦以理想、责任、时代使命相劝，陆焉识依然坚守“我只属于我自己”的个体立场。此刻，西方文化塑造的“精英自我”与中国文化要求的“伦理角色”产生剧烈冲突，他长期处于精神撕裂、身份错位的状态。

真正对陆焉识完成“文化重塑”的，是西北荒漠的劳改生涯。劳改场是中国集体主义文化最极端的形态：在这里，没有个体、没有姓名、没有尊严、没有思想，只有编号、服从、生存。在极端环境下，西方文化赋予他的个体意识、尊严、自由被全面压制；而中国文化中“隐忍、生存、责任、坚守”等底层特质被重新唤醒。这一过程，是西式自由身份的死亡，也是中式生存身份的诞生。

严歌苓的深刻之处在于，陆焉识并未在集体化体制中彻底丧失自我，而是在两种文化的交叉边缘区实现新的身份建构。在极端苦难中，他保留了西方知识分子的精神底色——以“盲写”坚持思考与书写；与此同时，在中国式的亲情、等待、苦难与守护中，他逐渐理解责任、忏悔、珍惜与归属。西方文化赋予其灵魂与理性，中国文化赋予其根基与情感；西方文化使其成为知识分子，中国文化使其回归完整的人。

最终，陆焉识从西方式的自由个体，转变为东方式的集体成员。其身份重构，是跨文化冲击下现代知识分子的典型命运，是特定历史时期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缩影。他的变化表明：真正的主体身份并非单一文化的产物，而是在跨文化碰撞、破碎与重建中产生的复杂人格。

### 参考文献：

- [1] 梁艳.文学“新天下主义”中“边缘化”和“中心性”的纠葛——严歌苓和新移民文学价值的再讨论[J].中国比较文学,2016,(3):19-27.
- [2] 冯美.多重回声:严歌苓小说文本间的互文指涉及意义关联[J].中原文学,2025,(8):26-28.
- [3] 严歌苓.陆犯焉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
- [4] 龚自强.“后伤痕”书写的复杂性——论历史与人性深度交织的《陆犯焉识》[J].当代作家评论,2013,(2):178-187.

这一人格形成恰与严歌苓自身的跨文化境遇形成深刻互文。作为游走于中西文化之间的移民作家，严歌苓在文化碰撞中不断反思母语、历史与自我认同。她与陆焉识共享文化边缘人的生存境遇，这种不归属任何单一文化的游离状态，并非身份的失落，而是一种更具普遍性的人类立场。梁艳将其概括为新移民文学的“边缘”所蕴含的“中心性”，即在跨文化夹缝中，反而抵达超越民族、回归人性的文学中心命题<sup>[1]</sup>。

严歌苓将其对个体与集体关系的思考，投射于陆焉识的身份蜕变之中，既批判西方式的个体放纵，亦反思东方式的集体压抑，进而在两种价值之间探寻人性的平衡点。通过陆焉识的“身份清零”与“人性回归”，严歌苓完成了自身跨文化立场的美学表达：当一切文化身份、社会身份、阶级身份被剥除之后，人最终回归的不是西方或东方，而是普遍意义上的人性、情感、良知与爱。

综上所述，真正的文化身份，既非对西方的盲目崇拜，也非对传统的完全遵从，而是在跨文化的碰撞与重构中，形成以人性为核心、以情感为根基、以良知为尺度的完整人格。严歌苓以跨文化的双重视角书写陆焉识的命运，不仅是对一段历史、一类知识分子的回望，更是对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出路的深刻探寻。在中西文化不断冲突、个体与集体争辩仍存的现代语境中，陆焉识的身份重构说明，只有超越文化对立、挣脱意识形态束缚、回归普遍人性，知识分子才能在时代洪流中守住自我、完成救赎。这既是《陆犯焉识》的思想深度所在，也是严歌苓跨文化写作最恒久的价值与意义。